



宁夏大学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十六国北朝权力 嬗代新探

► 杨学跃 / 著 ◀

SHILIUGUO BEICHAO QUANLI
SHANDAI XINTA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宁夏大学优秀学术著作丛书

十六国北朝权力 嬗代新探

杨学跃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六国北朝权力嬗代新探/杨学跃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2

ISBN 978-7-5161-7521-7

I. ①十… II. ①杨…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中国—十六国时期
②政治制度—研究—中国—北朝时代 IV. 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1802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6.75
插 页 2
字 数 283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之时期，也是民族关系发生最剧烈变化之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在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地位，重要性无须论证。长期以来，魏晋南北朝史不仅是学术界的研究重点，而且大家辈出，成果繁富，积累深厚，臻于极致。为此，杨学跃选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问题进行研究，需要足够的学术勇气，面临很大的学术挑战。

首先是材料问题。材料是历史的载体，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离开材料也就无所谓历史的存在。杨学跃的《十六国北朝权力嬗代新探》一书，面对的材料主要有三种。一是古籍文献；二是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三是其他材料，内容繁杂，别择困难。龚自珍《尊史》言：“不善入者，非实录。”“何者善入？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入矣。”这就是讲史家掌握材料的本领。所谓良史，必须“善入”，不“善入”者非良史。通览书稿，可以看出杨学跃不但在材料的收集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到了“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优人在堂下，号咷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而且在材料的甄别、阐释上表现出很好的专业训练和娴熟的运用能力。

其次是理论问题。近代新史学以来，历史已不再是记诵之学而成为解释之学。史家研究历史，只有在历史事件的千变万化中，指点出变化的秘密和规律，才会有精当高情之论。正因为如此，理论修养的高低往往成为

评价史家水平高下的重要标准。杨学跃书名定为“新探”，反映了作者对研究的问题试图在理论上做出自己的解释。这样做面临很多困难和巨大风险。困难主要来自对作者理论修养的要求，风险则来自作者的解释能否自圆其说。今天，回头检视一下为期六年的写作过程，作者表现出的探索理论问题的巨大勇气始终贯穿如一，这不但为书稿增添了强烈的理论色彩，而且正是通过这样的追求，使其构建的理论系统更加成熟和深刻。《十六国北朝权力嬗代新探》一书，大胆采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学、人口学等理论或方法，对6世纪以前北方“五胡”活动的轨迹进行了梳理和探索，紧紧抓住游牧民族急需性资源和权力的依赖关系的主线，论述了“五胡”在草原地带、内迁、在中原建立民族政权的演进历程，揭示了游牧社会从部落部族到部落联盟、游牧政权乃至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微观与宏观的内生机理。论述了游牧民族社会的“卡里斯玛型”权力，是一种迥异于汉族王朝权力组织结构的形式。这种权力结构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改变，是影响其社会兴衰的主要原因之一。作者将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奥尔森的共容利益理论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来。奥尔森认为，共容利益集团从推动经济增长中获得较大的收益份额，并从造成经济衰退中承受较大的损失份额，利益集团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共容利益。作者受这一理论启发，认为“胡族”政权最终同农耕世界形成了共容利益，才使得“卡里斯玛型”权力从破坏性使用过渡到建设性使用，最终发挥了重大作用，是中国历史再次出现大一统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理论探索值得称道，这些结论值得深思。

杨学跃是我的博士研究生，也是我的同事。学跃本质笃朴，志向高远，性情执着，追求完美，且治学重视理论，关照细节。这些禀赋对他的为学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文如其人，通览《十六国北朝权力嬗代新探》一书，材料丰富，叙述翔实，理论色彩浓厚，观点新颖独到，引人入胜，值得推荐。

遵作者之请，特作短文，以为序。

王银春

2015年6月20日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十六国以前“五胡”权力关系之考察	14
第一节 “五胡”生存地域与权力关系的探讨	14
第二节 内迁“五胡”权力关系变迁	57
第二章 十六国之权力嬗代	84
第一节 汉末乱象对“五胡”的影响	84
第二节 “五胡”生存地域的扩展及其应对	91
第三节 权力关系与资源依赖	113
第三章 北朝前期——北魏之权力嬗代	149
第一节 拓跋鲜卑早期权力嬗代	149
第二节 拓跋的新生	159
第三节 太和改制——北魏政权与农耕世界的全面对接	175
第四节 资源分配与北魏末年的内乱	202
第四章 北朝后期之权力嬗代	224
第一节 强力与北朝后期演进	224
第二节 兵农合——共容利益的构建	227

第三节 资源依赖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	247
参考文献	253
后记	260

绪 论

一 论题的缘起

从整体中国历史发展脉络来看，秦汉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从此统一的格局成了历史发展的主流。隋、唐时期，是继秦汉王朝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较大地域的统一时期。介于秦汉与隋唐帝国之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除了西晋时的短暂统一外，是中国历史上长期分裂混战时期。尤其是西晋内乱后，北方少数民族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在中国北方建立了十六国北朝诸多民族政权。十六国北朝建立是秦汉帝国发展的终结，而隋代北周，一统中国南北又是下一个大帝国内时代——隋唐帝国的起点。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古老的民族走完自己的历程，从历史上消失了，中国古代民族史的研究，魏晋南北朝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下限。因此，史家从不同视角出发，对造成自西晋末年至隋统一中国近三百年，从分裂到统一、由乱到治局面之缘由进行了诠释。总体来看，魏晋南北朝既是一个乱世，也是各民族大规模迁徙和融合时期。民族融合，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形式和特点就是胡族的“汉化”和汉族的“胡化”。陈寅恪先生说：“一个胡族与汉族融合，须待这个胡族接受汉文化，并被视为汉人、杂汉之后。”^① 因此，胡汉融合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黄烈先生认为，促进各少数民族走向迅速与汉族的融合是政权的建立，其民族共同体和政权是朝相反方向发展的，其政权越巩固，民族共同

^①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113页。

体越分散与衰落，从而迅速地向汉族全面转化。^① 罗贤佑认为，“汉化，即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通婚并融于或同化为汉族的过程”^②。陈寅恪认为，“北魏之制度有接受中国历代原有的制度者，有接受其敌对之南朝前期之制度者，也有承袭北亚游牧之制度者”。因此，少数民族的“汉化”，被认为是血缘上的、文化上的、民族政权制度上的全面汉化。陈寅恪先生认为，“在我国历史上，统一不能从血统着手而要看文化高低。文化低的服从文化高的，次等文化服从高等文化”^③。因此，“胡族”的“汉化”被多数学者认为是隋唐大一统形成的重要原因。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他们总会讲自己曾经特有的民族传统和文化，但最终会有一个不得已的感慨：“现在都汉化了！”同样，说一汉人“胡化”，就会有一种被歧视之嫌疑。那么“汉化”真的就能揭示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与国家一统的全部真谛吗？

要厘清这一问题，我们应该从汉族形成来重新审视这一问题。各国早先文明的孕育，得益于大河流域和平原。这一切又源于人类对生存资源本能的需求。当人类在适合农耕的地域，掌握了农耕技术后，利用自然资源——可农耕的土地、可栽培的植物以及可驯化的动物而进行主动的物质生产，并建立起相应的生存资源分配方式后，农业社会便建立起来。因此，农民对生存资源的需求、控制与组织权力结构的结合，是其目标与实现手段的有机组合系统，依靠这样的系统，农业社会才得以延续乃至壮大。中国的文明中心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尤其是在黄河流域，依靠农业文明，华夏族很早就建立起国家政权。吕思勉先生认为，“文化本是人类控制环境的工具，环境不同，文化自因之而异。及其兴起以后，因其能改造环境之故，愈使环境不同。人类遂在更不相同的环境中进化。其文化，自然更不相同了”^④。所以，文化同生活环境有最为密切的关系。在这里，本书认为，文化是人类创造出来以适应环境的生产技术、资源、资源生产、资源分配方式（制度）、相应的组织及行为模式的总和。文化从软实力上说，

① 黄烈：《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

② 罗贤佑：《中国民族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③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版，第230页。

④ 吕思勉：《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就是适应生产方式规则的“沉淀”。从某种程度上说,汉族(华夏族)创造了农业文明,而农耕又铸就了汉族(华夏族)。因此,汉族(华夏族)的形成,也就预示着汉文化的形成。从起源上来说,农业生产创造了农业文化。汉文化是农业文化最大的子类,但她并不是农业文化的全部。因为农业文化是建立在农业生产方式之上的,只要是自然环境相差不大,就会产生相类似的生存资源及建立在此资源生产和分配之上的制度(规范)和组织。因此,从事农耕生产的人类,都可以创造农业文化,并且会有创新,也就是吕思勉先生所说的进化。汉族文化之所以能够源远流长,就是因为汉族坚守农耕生产方式,创造、创新农业文化。因此,汉文化是农业文化的代表,但并不是农业文化的全部。如此来说,现实中,少数民族某些传统和文化的消失原因表面上是因为“汉化”,其实质上是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使然。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因果,不论是研究历史还是面对现实,既尊重了事实,又将包括汉族在内的所有民族从各自文化的“枷锁”中释放出来,找到共识,才会有理有据地展开各项工作。回到本研究原点,我们可以这样说,“胡族”的农业化是隋唐大一统帝国形成的主要原因。

“胡族”的农业化,意味着他们必须转化成一个农耕民族,这并不是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如果从公元304年匈奴人刘渊建立刘汉政权算起,至隋统一中国,至少也有近三百年历史,几乎贯穿了魏晋南北朝(历时369年)时期。农业文化并不是一个文化因子的单一体,而是生存资源、生产技术、资源生产、资源分配方式、生产组织及文化记述等多因素的复合体。“胡族”从事畜牧业生产,其文化是游牧文化。推动游牧人群由游牧文化转化为农业文化的进程中,农业文化的诸因素都可能起作用。然而,在诸因素中,研究那些从开始起,长时段影响并贯穿“胡族”农业化过程始终的因素,也就是起决定作用的基本因素,就能抓住“胡族”农业化的内生动力,从而解释民族融合的本质。生产技术、资源生产、资源分配方式及生产组织等诸因素,要么是“胡族”农业化链条上的不同环节,是满足特定因素条件而产生的,要么是同一过程中的先后环节,并不能满足上面提到的决定因素特征。汉族文化记述,可能增进对农业社会了解和认识,如史书中描述“胡族”首领“习《毛诗》,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等,但从史书记载来看,也只是“胡族”贵族中个别人物的特例,并不具

普遍性。农业化是一个包括认知和实践有机统一的复杂过程，单凭对农业社会的记述认识，是远远不够的。生存资源，也叫急需性资源，它具有中心性和匮乏两个特性。资源的中心性是指，直接与人类生存相关的资源，如粮食、生活必需品等，是人类生存须臾不能离开的客观物质；匮乏是指中心性资源的稀缺性，如空气是人类生存的中心性资源，但它并不具有稀缺性，同样，黄金是匮乏资源，但在人类生存活动中，又不居于中心性。因此，研究那些居于人类的中心性且又匮乏的资源，对人类来说，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样，生存资源就成为我们要寻找的，从开始起，长时段影响并贯穿“胡族”农业化过程始终的因素，也就是起决定作用的基本因素。

起初，游牧人群的生存资源同农耕社会的生存资源并不相同。草原上的游牧人群掌握游牧技术后，通过畜养牲畜，将草原上的牧草转化为人类能够食用的畜产品，从而维持着畜牧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草原上的牧草资源是游牧部族赖以生存的中心性资源。游牧部族是适应游牧技术而产生的社会组织，其绝大部分活动都围绕生存资源获取而展开。因此，对生存资源——牧草资源的依赖，是游牧组织中权力关系^①产生的最基本的因素。因此，生存资源同游牧组织中的权力有着天然的契合关系。因此，游牧部族对生存资源的需求、控制与组织权力结构的结合，是其目标与实现手段的有机组合系统，依靠这样的系统，游牧部族社会得以延续乃至壮大。游牧部族由于受自然气候、单位面积草地提供资源量的限制，以及人口数量的不断增长，总体上处于生存资源匮乏的状态。寻求生存资源是贯穿游牧部族、超部族联盟或政权在草原地带、内迁乃至到中原地区活动的主线。正是“五胡”所依赖的生存资源变化，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组织及权力结构不断地发生变化，不论这种变化是自觉还是不自觉。“五胡”生存资源的生产、结构改变，完全依赖于农耕社会运行规律的进程，就是农业化诸要素发生作用，并改变他们原来文化的过程。

本书是在以上所述的逻辑构建中展开讨论的，必然会挂一漏万，而忽

^① 权力关系也可能建立在血缘等基础之上，但所有关系中，首先是以保证个体或者组织生存为前提，所以，没有生存资源，个体或者组织难以为继，也就失去继续讨论下去的必要了。

视了如宗教等其他因素。这种过分的简化，需要特别说明，其目的是追踪那些推动人类群体变化，且最为基本的因素运作机理与过程，试图将本研究引向深入，而不是贪图“全面”。

二 学术回顾

2002年，《历史研究》发表了曹文柱《20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①一文，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做了深入的梳理和综评。曹文认为，在20世纪以前，历代学者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总体来看，皆囿于循环史观，基本的路数不过是著史、考史和评史而已。19世纪至20世纪，受西方各种进化观、发展史观为核心内容的新史学影响，中国史学开始通过分析史料去寻找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动因、联系和带有某种规律性的认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也因之翻开崭新的一页。曹文将20世纪中国南北朝史研究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在这两个时期中，又分为若干阶段。在研究内容、对象上，分为“关于社会性质和社会经济的讨论”、“政治史”、“民族史”、“文化史与社会史”、“大族个案研究和人物评价”几个部分。曹文的学术回顾与述评中肯。21世纪以来的十多年时间里，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不断推进，许多学者运用新的理论、方法取得了不菲的研究成果。十六国北朝研究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果按照曹文柱的划分，应在“民族史”研究范围。但在实际研究中，十六国北朝研究在研究领域、方法、理论等方面，已经突破了传统民族史研究的范围，表现为同研究汉族中原王朝一样，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同时深入展开，并且成果丰硕。鉴于此，现仅就学界对十六国北朝研究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成果进行梳理。

（一）综合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历史、分布、起源和迁徙的著述。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白寿彝《中国通史：中古时代·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等著作中，对十六国、北朝演进史有详细论述，其中王著对“五胡”的发展轨迹又有较详细的研述。何兹

^① 曹文柱：《20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全《魏晋南北朝史略》长于对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轮廓、体系、线索的认识,提出了对这一时代历史问题、历史研究的看法。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古老的民族走完自己的历程,从历史上消失了。因此,中国古代民族史的研究,魏晋南北朝应该是一个阶段性的下限。由此上溯,可以弄清中国古代一些重要少数民族的脉络。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注重对史实进行全面系统的叙述。马长寿《北狄与匈奴》、《氐与羌》、《乌桓与鲜卑》对“五胡”源流、分布、迁徙考述详尽,对诸族关系、融合有较为深入的研究。林干《匈奴史》对匈奴有专考。论文有周伟洲《魏晋十六国时期鲜卑向西北地区的迁徙及其分布》(《民族研究》1983年第5期)、史念海《十六国时期各割据霸主的迁徙人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3、4期)、陆庆夫《十六国时期五凉地区的人口迁徙》(《兰州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等。

(二)研究十六国历史、政治制度史的著述。分论十六国史的著作有周伟洲《汉赵国史》、《南凉与西秦》、《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蒋福亚《前秦史》,齐陈俊《五凉史略》等。全面探讨十六国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性质和历史作用的论文是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唐文认为,晋末各族变乱源于种族和阶级的双重矛盾。各族统治者所建立的政权,一方面有种族报复的特点,另一方面又要同汉族上层分子合作。黄烈《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的几个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认为,不应该仅仅根据各民族政权上层统治者的族属来确定该政权的民族性质,对这一时期的民族战争和民族融合也要做这样的辩证分析。促进各少数民族走向迅速与汉族的融合是政权的建立,其民族共同体和政权是朝相反方向发展的,其政权越巩固,民族共同体越分散与衰落,从而迅速地向汉族全面转化。研究十六国政治制度论文还有冯君实《十六国官制初探》(《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邱久荣《十六国时期的胡汉分治》(《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王延武《后赵政权胡汉分治政策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2期)、蒋福亚《前秦政权的民族性》(《北朝研究》1990年第1期)、陆庆夫《略论五凉的民族分布及其融合途径》(《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李培栋《北魏太和改制前胡汉形势论》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陈友冰《十六国北魏时期的“夷夏之辨”》(《史林》2000年第4期)、李海叶《前燕中原时期胡汉分治制度考》(《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等。

(三) 北朝历史、政治制度史的著述。研究北朝历史的有杜士铎主编的《北魏史》、严耀中的《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张金龙的《北魏政治史研究》等。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认为,“五胡”在十六国、北朝的活跃之后,融合于汉族。但这种融合并不是简单的血缘融合,胡汉之分实则作为一种文化分际,最终出现文化融合,才会有胡汉融合。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认为,北魏之制度有接受中国历代原有的制度者,有接受其敌对之南朝前期之制度者,也有承袭北亚游牧之制度者。还有周一良《魏晋南北朝札记》、《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田余庆《拓跋史探》等著作。周一良对北魏的政治制度变迁等有详考。田余庆认为,拓跋部族“野蛮”的制度设计,在某种程度上孕育着文明。研究北朝政权性质有唐长孺的《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魏晋隋唐史论集》),认为拓跋部落早在猗卢统治时期即开始形成国家,其发展道路乃是由家长奴役制向封建制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奴隶制不占据主要地位。研究拓跋鲜卑社会性质和封建化的论文还有孙钺《拓跋鲜卑在接受汉族文化过程中新旧势力的斗争》(《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曹永年《早期拓跋鲜卑的社会状况和国家的建立》(《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曹文柱《论北魏初年都址的选择》(《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蒋福亚《论慕容鲜卑的封建化》(《历史论丛》1988年第3期)、高敏《论北魏的社会性质》(《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李凭《北魏离散诸部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张小虎《论北魏专制皇权的形成》(《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杨恩玉《北魏离散部落与社会转型——就离散的时间、内涵及目的与唐长孺、周一良、田余庆诸名家商榷》(《文史哲》2006年第6期)等。

(四) 研究十六国、北朝兵制的著述。对十六国、北朝兵制的研究有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南北朝讲演录》,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陈玉屏《魏晋南北朝兵户制度研究》、《中国军事史》(第三卷)、《中国军事通史第

八卷·两晋南北朝军事史》等书皆有详细的论列。研究论文有何兹全《十六国时期的兵制》(《燕国论学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旷天伟《十六国时期胡族军队的给养》(《江西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论十六国时期少数部族政权的兵役》(《历史研究》1991年第6期)、《十六国时期士家兵户说考辨》(《青海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马欣《十六国军制初探》(《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张庆捷《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所见拓跋职官初探》(《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鲍桐《北魏北疆几个历史地理问题的探索》(《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3期),张敏《论北魏长城——军镇防御体系的建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2期),艾冲《北朝诸国长城再探索——兼与朱大渭先生商榷》(《烟台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陈琳国《十六国时期的“军封”、营户与依附关系》(《华侨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苏小华《西魏北周军队构成的变化及其对北朝军事的影响》(《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胡玉春《北魏六镇起义的原因和启示》(《内蒙古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等等。从以上史家研究来看,“胡人当兵,汉人种地”是十六国北朝兵制的主要特征,北朝后期建立了兵农合一的府兵制。

(五) 研究十六国、北朝的经济史著述。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韩国磐《北朝经济试探》、刘静夫《中国魏晋南北朝经济史》、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等书是这一时期经济史方面的重要著述,其中李剑农的著述,在占有丰富的史料基础上,提出诸多有启发的议论和结论。代表性论文有唐长孺《均田制度的产生及其破坏》(《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王利华《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的变动》(《历史研究》2001年第4期)、蒋福亚《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徙少数民族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杨际平《论北魏太和八年的班禄酬廉》(《厦门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魏明孔《北魏立三长、行均田孰先孰后》(《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等。

(六) 中国台湾、欧美、日本学者的有关著述。中国台湾学者对十六国北朝的研究著述有郑钦仁《北魏官僚机构研究》(稻禾出版社1975年版)、刘昭民《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许倬云《许倬云观世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刘学铤《五胡史论》等。郑仁钦认为,“异民族王朝的统治,除了任何政权所看到的支配关系之外,又带有征服与殖民性格;据笔者之观察,北魏早期有充分的这种性格”。刘昭民将气象学、物候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研究了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并认为气候变迁是导致北方民族南下的主要因素。许倬云认为,气候变化是民族迁徙重要原因之一。王明珂是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研究理路的集大成者,也是开创历史研究同田野调查相结合、成功解读历史的著名学者。王氏提出游牧部族所有的历史特性都根源于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都是长了四个腿”能够移动这一属性,其研究理路和成就再次将中国人研究北方游牧民族历史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更接近于历史本相。毛汉光以关陇核心区域构建等研究北朝政治制度,其研究是在陈寅恪著述启发下的实证研究。刘学铤《五胡史论》是中国台湾学者又一部“五胡”专史,其研究主要从文化、胡汉双视角来研究胡汉融合等方面问题。

欧美、日本学者的著述有美国学者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袁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日本学者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方壮猷译,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等著作。拉铁摩尔强调经济生态与历史的关系,注意华夏之扩张与北方游牧世界相生相成的关系。巴菲尔德认为,在历史上当华夏帝国统一时,北方游牧部落也凝聚为游牧国家,以胁迫或掠夺中国来得到物资;当华夏帝国分崩离析,北方游牧国家则散为一个个的游牧部落。美国学者魏特夫《辽史社会史》中将北方游牧人群至中原建立王朝划分为两种类型:十六国北朝是“渗透王朝”^①,辽夏金元清则为“征服王朝”。谷川道雄“十分关注民众的动向;力图以民众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对立关系为中心来把握历史的脉络。认为乡党共同体

^① 魏特夫认为,十六国北朝是“五胡”通过不断地向南迁徙,越过农牧分界线,呈现一个逐渐渗透的态势,建立王朝则类型上应属渗透王朝;辽夏金蒙元则是直接对中原的征服,建立的王朝则类型上应属征服王朝。

具有与国家共同体相连续的性质，因此，贵族阶层的治者理念也从乡党到天下国家自然地呈现同心圆展开”。翻译成中文的论文有日本学者古贺昭岑《论北魏部族的解散》（刘世哲译，《民族译丛》1991年第5期）、韩国学者朴汉济《西魏北周的赐姓与乡兵的府兵化》（《历史研究》1993年第4期）等文。

从以上专家学者的著述来看，主要研究取向有：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中国大陆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来诠释胡汉冲突和胡汉融合；一些中外学者将“五胡”对农耕社会控制视为一种“殖民”行为；国内外一些学者以阶级分析方法来认识十六国北朝诸“胡族”政权的性质；以文明的视角，将游牧部族视为野蛮人群，并将游牧生产方式贬为落后生产方式；从民族视角，将十六国北朝的历史归结为“汉化”或者“胡化”过程等。以上大部分史家的研究取向和研究结论，是从不同视角出发，对“五胡”历史演进的合理性阐释，对本著展开讨论有着引领和启迪作用。亚洲中部草原民族游牧生产方式同农耕生产方式相比，是人类适应不同自然环境而产生的不同生产模式。这至少可以断定，这一地区的游牧社会并不是从渔猎社会向农耕社会过渡的中间环节，有其特殊性。因此，从游牧民族内部出发，从生存资源的需求、控制同游牧组织权力结构结合、变迁的视角来系统探索“五胡”历史的演进，还是一个薄弱环节。

三 资源与权力——贯穿本书的研究理路

马克斯·韦伯将权力定义为：在社会关系内，行动者（个人或组织）具有可以排除各种抗拒以贯彻其意志的可能性（Chance），不论此可能性基础为何。美国社会学家格尔哈斯·伦斯基说：“如果我们按照韦伯的观点，将权力定义为个人或集团在即使遭到他者反对时都能贯彻其意志的可能性，那么就可以说，权力将决定几乎所有的由社会所拥有的剩余产品的分配。”^① 英国社会学家罗德里克·马丁“权力关系与依赖”研究模型认为：技术和自然资源决定着急需性的情况；急需性和财产继承导致对资源

^① [美] 格尔哈斯·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关信平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